

二十世纪学科学术史丛书

HANYU BIYU YANJIUSHI 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语比喻研究史

◎ 冯广艺 著

董

汉语比喻研究史

汉语比喻研究史

汉语比喻研究史

汉语比

汉语比

汉



二十世纪学术史丛书

汉语比喻研究史

冯广艺著



序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比喻研究史/冯广艺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ISBN 7 - 5351 - 3190 - 5

I . 汉 … II . 冯 … III . 汉语—比喻—研究—历史
IV .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25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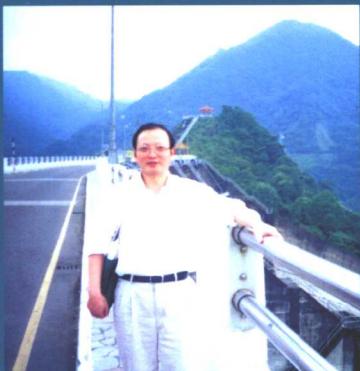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传真:027 - 83619605
邮购电话:027 - 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430074·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2 插页 11.5 印张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45 千字 印 数:1 - 3 000

ISBN 7 - 5351 - 3190 - 5/H · 126 定 价 1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冯广艺，1957年出生，湖北武汉人，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考上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后出站于复旦大学，获中国博士后证书。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出版专著《变异修辞学》、《超常搭配》、《文学语言学》、《艺术语言六十法》、《语境适应论》、《汉语修辞论》，主编《汉语语境学概论》、《语言素质概论》、《语言文学丛书》、《素质教育丛书》等，参编著作10部，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湖北师范学院院长。

封面设计 | 责任编辑
牛红 | 漆咏德

中国博士后科学资助项目

**This project was supported by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比喻理论	17
第一节 植根于辩说艺术的先秦比喻理论	17
第二节 先秦其他典籍中的比喻学说	30
第三节 先秦与古希腊比喻学说比较	36
第二章 两汉时期的比喻理论	47
第一节 “诗有六义”说及对后世的影响	48
第二节 汉代论比的其他学说	58
第三节 王逸论《离骚》中的“比、兴”及“诗有物象 比”说的形成与发展	72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比喻理论	84
第一节 批评滥用比喻	84
第二节 对比喻的定义	86
第三节 刘勰的比喻理论	87
第四节 佛典中的比喻学说	96
第四章 唐宋元时期的比喻理论	98
第一节 唐代的比喻学说	99
第二节 宋元时期的比喻学说	109
第三节 陈骙《文则》中的比喻学说	125
第四节 以批评诗	129
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比喻理论	140

第一节	“比兴”学说的发展	140
第二节	对“比喻”的各种形式的论述	148
第三节	两本比喻专书	151
第四节	论比喻的运用	154
第六章	近现代的比喻理论	162
第一节	近代的比喻研究	163
第二节	现代的比喻研究	169
第七章	当代的比喻理论(上)	194
第一节	关于比喻的一般理论研究	195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革新	202
第三节	对新的比喻类别的探讨	221
第四节	几部研究比喻的专著	242
第五节	比喻与其他辞格的区分	257
第六节	隐喻	260
第八章	当代的比喻理论(中)	268
第一节	对比喻构成成分的研究	268
第二节	比喻的外部联系分析	279
第九章	当代的比喻理论(下)	290
第一节	作家的比喻学说	290
第二节	对若干作家的比喻实践的研究	319
主要参考书目		360
后记		363

绪 论

—

比喻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写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比喻都是人们乐于运用的一种辞格,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说,“尤为重要的是掌握比喻”(《诗学》),我国古代学者孔子也提出了“能近取譬”(《论语》)的主张,比喻是古今中外学者都十分关注的辞格,它伴随着修辞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修辞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中国比喻理论的发展,能从某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修辞学发展的进程。

比喻是中国古代学者最先论述的语言现象之一。先秦时期是我国比喻理论和比喻实践的源头。“修辞立其诚”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修辞的社会功能,也拉开了人们研究修辞的序幕。先秦诸子的作品中大量运用比喻来说明事理,先秦诗歌的代表作《诗经》和《楚辞》中的比喻更是俯拾即是,可以这样

说,先秦诸子的各种学说,各种观点的阐述都离不开比喻。先秦诸子的各种理论中,比喻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荀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都对比喻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侧面的论述,因而汉语比喻理论从一产生就富有独特的内涵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由于中国传统的经典大量地产生于先秦,加以先秦又是中国比喻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所以汉代以后,自然会产生大量论述先秦经典中的比喻的学说,这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经解”修辞论中的比喻理论,如关于诗经的“比兴”手法的论述,王逸关于楚辞用“比”的论述,刘勰阐述比兴的专论等等。无论是先秦建立在辩说基础的比喻学说,还是汉魏建立在解经基础的比喻学说,都以其鲜明的特色证明:中国古代的比喻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功用性。这与中国古代的学术大环境有关,作为修辞学中的一个方面,比喻自然跳不出历史和文化给它规定的圆圈。

功用性决定了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比喻时,并不是从纯语言结构形式入手的,所以我们在古代的比喻理论中看不到像现代学者的“本体+比喻词+喻体”这一类的说法,而更多地看到的是“喻巧而理至”(刘勰)、“比喻,以切至为贵”(刘勰)、“兴喻以尽意”(王符)、“譬喻,不顺礼义,谓之奸说”(荀子)、“因物喻志”(钟嵘)之类的论说,宋代陈骙《文则》中详细地分出了十种比喻,也仍然没有从纯语言形式出发,这种情况直到现代修辞学产生之后才得到改变。从功用性这一点我们正好引申出与此相关的一个命题,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比喻理论是一种功能学说,这种功能学说正是中国修辞学几千年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国古代比喻理论的又一个特色就是它的

针对性,亦即它是适应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如前所述,先秦围绕辩说艺术而讨论比喻,汉魏围绕经解谈论比喻,隋唐宋诗词繁荣,于是,诗论、词论等当中就出现了很多讨论诗、词中比喻运用情况的学说。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兴起,于是,就这些文体中的比喻运用问题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这些现象恰好说明,修辞是一门实用性学科,比喻理论只有针对具体语言实际,才有其真正的价值。

中国古代比喻理论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民族性。我们曾将先秦的比喻理论和古希腊的比喻理论作过比较,先秦的比喻理论虽然与古希腊的比喻理论都是建立在辩说艺术之上的,但先秦的比喻理论无论是喻体的选择,还是喻意的表达,都从中国当时的具体社会实际出发,有自己的一套特有的法则,即《易·系辞》中所说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国古代比喻的运用,也是遵循这个法则的。我们通读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诗学》等著作,其中论述比喻十分详备,甚至在某些方面(如比喻的分类、比喻的形式研究等)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先秦比喻理论,只有在这一点上,缺乏中国古代比喻理论那么强烈的民族气息和人文性。

中国古代比喻理论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它由一般的泛泛而论逐渐发展到从某一个侧面,重点突出,这就使中国古代比喻理论带有某种专题性。例如关于比兴理论,自“六义”说提出后,学术界就开始了对“六义”的讨论,尤其是对其中“比兴”问题的讨论,因为“比兴”是中国文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自古至今“比兴”仍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关于比喻的适切性问题、关于比喻的分类问题、关于比喻的运用

问题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比喻理论中讨论的重要问题。由于古代学者往往只注意到其中的一个问题或一个方面,这就给现代学者一个感觉,即古代学者的比喻理论只是只言片语,或就事论事,语焉不详,或只论其一,不顾其他等,这就需要我们做详细的收集整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和发掘古代学者的比喻理论及其价值。

现代修辞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转向“语言本位”的研究,对比喻的探讨亦是如此。从原先注意外部功能论述比喻转向将外部功能和内在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是现代比喻理论的鲜明特色。自《修辞学发凡》产生以来,比喻的研究发生了巨大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

对比喻构成的语言结构特征作深入细致的论述,有的论著从喻体出发,有的从本体出发,有的从比喻词出发,或着眼于本体、喻体的相互关系等等;

——借鉴国外的修辞学理论以及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理论对比喻进行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新意的论著;

——对比喻的各个次类作某一局部的专题的研究,尽量避免泛泛而谈,通过局部的深入探讨来体现整体的面貌;

——对作家作品的比喻运用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比喻与作家语言风格等的联系;

——对国外的比喻理论作详细的评介,比较中外比喻理论的不同点以及比喻运用的不同特征;

——对比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出现了比喻研究的专著,如现代黎锦熙先生的《修辞学比兴篇》,当代袁晖先生的《比喻》,张明冈先生的《比喻常识》,李济中先生的《比喻论析》等等;

——对比喻与其他辞格的联系和区别进行论述,例如郑远汉《辞格辨异》,濮侃《辞格比较》中都有关于比喻与其他语言表达形式的比较的内容;

——对比喻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考察等等。

总之,比喻研究呈现出千姿百态、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修辞学领域里,比喻始终是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我们作过粗略的统计,仅《修辞学习》一本杂志,近十年来发表的论述比喻的文章就有 100 多篇。

关于比喻的各种形式和名称,现在已有几十种,如:明喻、直喻、暗喻、隐喻、喻代、提喻、倒喻、缩喻、简喻、对喻、引喻、扩喻、补喻、逆喻、互喻、环喻、反喻、交喻、回喻、迂喻、递喻、较喻、强喻、进喻、弱喻、等喻、连喻、博喻、复喻、联喻、类喻、叉喻、套喻、例喻、中喻、详喻、曲喻、语喻、质喻、讽喻、事喻、物喻、字喻、词喻等等,而且还有一些新的比喻形式被不断发现。

中国现当代的比喻理论,是在继承古代丰富的遗产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陈望道先生所说:“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手向古人要东西,一手向外国要东西。”^① 在研究方法上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即从解决语言表达的具体问题入手来研究比喻,这既体现了比喻理论的功用性、针对性特色,更重要地体现了比喻研究中脚踏实地,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为言语交际服务的实干精神。比喻研究的论著大量地分析具体语言材料,通过语言材料中的比喻运用的优劣说明比喻的实用价值。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比较法的运用,比较法包括对运用比喻和没有用比喻在语言表达效果

^① 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44 页。

差异的比较,不同语用者运用比喻的不同特点的比较,比喻与其他辞格的比较,比喻内部不同形式的比较,中外比喻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等等,这种比较不仅说明了比喻的实用价值,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对比喻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更加清楚明白。归纳法与演绎法并用,也是现当代比喻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比喻研究中运用得较多的是归纳法,但并不排斥运用演绎法,特别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探讨,例如宗廷虎、郑远汉、王希杰等先生就运用演绎法来分析汉语修辞中的具体问题。王希杰在比喻研究中,就较好地运用了演绎法,如他的《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等文,借鉴当代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成功地分析了比喻结构由深层向表层的转换等问题。一批年轻的学者在比喻研究上也大胆革新,成功地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姚亚平、李胜梅等人对比喻结构的系统分析等等。当然,任何方法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运用的,我们主张只要是能够解决比喻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运用哪一种方法或综合运用哪一些方法都是可以的,没有也不可能作硬性的规定。

如果将中国现当代比喻理论和中国古代比喻理论联系起来看,我们认为它们可以构成一部较为完整的比喻研究史。比喻研究史是中国修辞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比喻研究史和其他辞格研究史构成汉语辞格研究史,由汉语辞格研究史和其他修辞方面的研究史构成中国修辞学史,所以,汉语比喻研究史在汉语修辞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探讨汉语比喻研究史,无疑对丰富汉语修辞学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人们掌握比喻理论指导语言实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

二

关于比喻思维问题。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从认识论和人类文化的来源着眼,把基于神话和诗歌的象征语言的思维方式,称为“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inking),认为它是先于逻辑概念和表达方式而存在的。莱可夫和约翰逊说:“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体系。作为人们认知、思维、经历、语言甚至行为的基础,隐喻是人类生存主要的和基本的方式。”^①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列有“隐喻思维与修辞思想”一节,可见中外学者都十分重视“隐喻思维”(或曰“比喻思维”)问题,我们研究中国比喻研究史,也不能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宗廷虎先生在《中国修辞学通史·总论》中谈到了“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方式”,他说:

中国古代学者一贯重视“象”,讲天体,称为“天象”,讲人体,称为“脉象”,在语言运用中,诸如“想象”、“表象”、“意象”等词语很多,中国文字构成的基本方法也是象形的。“取象比类”,采取形象的手法来表达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思维方式,诸如比喻、象征、借代、类比等用得较多,形象思维比较发达,这与西方古代重视逻辑思维

^①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67)

形成鲜明的对照。^①

我们认为,比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手法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既言之“比”,就应该有两样事物相“匹配”,《尔雅·释古》说:“比,偶,匹,配,合也。”《淮南子·要略训》说:“假象取偶,以相譬喻。”由于比喻的特点是由两个事物进行比较,且这两个事物必须具有属类上的相异性和本质上的相似点,因此人们在交流思想、表达观念时运用比喻,自然构织了一幅描绘的景象。这幅景象包括他要说明的事物(被比物,即本体)和他从客观外界摄取的用来说明对象的事物(比物,即喻体)。维柯说:“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后来才用这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要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②”。维柯的话恰好说明了人们运用比喻时的思维过程(比喻思维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的比喻理论中往往特别强调一个“取”字,如孔子《论语·雍也》中的“能近取譬”,《诗经·大雅·抑》中的“取譬不远”,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君子取譬”,桓谭《新论》中的“近取譬喻”等等,这里的“取”字和“近”字都是极为重要的。“取”是一种手段,亦即从天地万物中摄取“象”来构成比喻的支撑点,“近”是一种性质,指“象”的性质,它要求人们用自己所观察到的客观事物,所熟悉的客观事物作为“取”的对象。比喻思维的前提是对客观事物的摄取并将其储存于主观的思

^① 宗廷虎、陈光磊:《中国修辞学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② 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8页。

维仓库里,然后将主观意念与客观外界有机地融为一体来构成比喻的支撑点。所谓比喻的支撑点即比喻的两极,一极是比喻运用者要表达的本体,另一极是比喻运用者摄取的用来说明本体的客观物象(喻体),比喻成功与否的关键就看寻找的喻体与本体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比喻思维发达与否,也就看在这个关系的处理上如何了。钱钟书先生提出的“比喻二柄多边说”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如果说人们在表达思想观念时存在着比喻思维的话,那么这种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天地万物中探寻与主观意念(包括情感、意识、态度、心境等等)相匹配的客体,于它们相异性的表层挖掘出相似性的深层,从而表达出两种物象融合后所赋予的意义内容。

比喻依赖于联想和想象,没有联想和想象也就没有比喻,从这一点看,比喻思维是发散型的,开放型的,决不是收敛型和封闭型的。运用比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将自己的心绪与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联想和想象中,获取喻体和本体的本质联系。《孟子·离娄下》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用比喻说明君臣的关系,十分恰切。钱钟书在评论宋代诗人忽视对现实生活源泉的挖掘时,说:“把支流当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的流行性感冒。”^① 这样的比喻用得何等精妙!比喻联想机制是一切比喻的基本机制,比喻思维的具体形态就是联想。联想分为多种类型,如类比联想、类似联想、对比联想、因果联想、接近联想、部分和整体联想、种和属的联想等

^①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